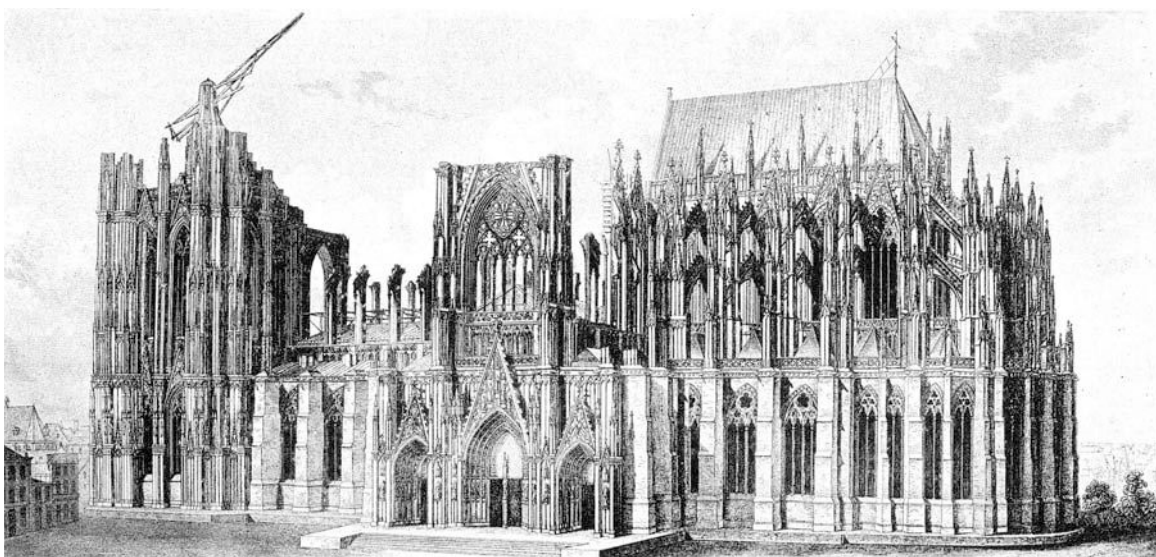


法論觀塔

晚清學者所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李雪濤*

1840年以來晚清知識分子到西方與陌生的他者遭遇旅行，其間的感受和經驗已經不可能納入已知的世界體系之中了，儘管他們的遊記仍然大都以傳統的日記方式來表達。這些在歐洲名勝前發思古之憂思的學者，由於時空的轉移，更容易透過他者對自我身份認同予以追問並進行歷史之比照。本文選取了他們之中的九位，撇開他們遊記背後的深層思考，着重考察他們對科隆及其大教堂的描寫。



建造中的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這個題目是從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1907年元月13日）康有為遊科隆大教堂之後所寫的〈法論觀塔記〉而來。1840年以後，中國智識分子開始走出“閉關鎖國”的國門，到日本、歐美去遊歷和出使，從而實地去接觸和瞭解當地社會和文化的各個層面。面對與大清天朝迥異的一切，這些智識分子進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

此他們的遊記並非簡單的風物描寫、純粹的地理考察，而是他們在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吸引後，走向世界以尋求強國富民的心路歷程。古典中國智識份子在鴉片戰爭後真正面臨“亡國滅種”的恐懼，才痛下有條件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決心。旅行——特別是到西方與陌生的他者遭遇的旅行，已經無法再以對傳統的反思作為自我實現的一種

* 李雪濤，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從聖壇往西看 Max Hasak (1856-1934)

方式了。儘管這一時期的遊記仍然大都以傳統的日記方式來表達，但他們在西方的感受和經驗已經無法納入已知的世界體系之中了。因此，這些出使西方的報告與其說具有文學意義，不如說更多地具有歷史乃至思想史的意義。這些在歐洲名勝前發思古之憂愁的中國智識分子，由於時空的轉移，更容易透過他者對自我身份認同予以追問並進行歷史的比照。他們的這些文字不僅僅是個性化的個人的體驗，更記載了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和艱難的轉變。本文撇開這些學者遊記背後的深層次思考，希冀對他們中的部分人對科隆及其大教堂的描述做一梳理。

一

多年前我在波恩大學留學時，副專業是比較宗教學和日爾曼學。記得在日爾曼學的碩士口試中，由於我所選的其中一個題目是“青年德意志”，作為著名席勒專家的余樂斯(Norbert Oellers)教授就問了有關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中的幾個問題。在提完該問的問題後，他突然問道：海涅從亞琛(Aachen)到科隆的旅行，為甚麼到了科隆之後才開始描寫大教堂(Dom)？那麼高大的建築在當時並沒有其它高大建築物的萊茵谷底，他為甚麼早沒看到呢？我當時完全懵了，很快用腦子搜索了我讀過的所有相關文獻，好像並不知道答案，最終祇能無奈地搖搖頭。余教授卻不慌不忙地向我解釋道，由於宗教改革而停止建築的大教堂從1842年開始繼續修建，直到1880年才得以全部完成。因此，1843年11月海涅到科隆的時候，大教堂的雙塔根本就沒有建成，他自然在遠方沒能看到了。這實際上是大教堂建築史的問題，並非跟“青年德意志”有關。不過，余樂斯教授的問題，讓我開始關注科隆大教堂的建築和藝術史了。

海涅一直不遺餘力地批判歐洲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對天主教的教堂自然沒有甚麼好感：

看啊，那個龐大的傢伙/在那兒顯現在月光裡！/那是科隆的大教堂/陰森森地高高聳起。//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獄，/狡猾的羅馬信徒曾設想：/德國人的理性將要/在這大監牢裡凋喪！⁽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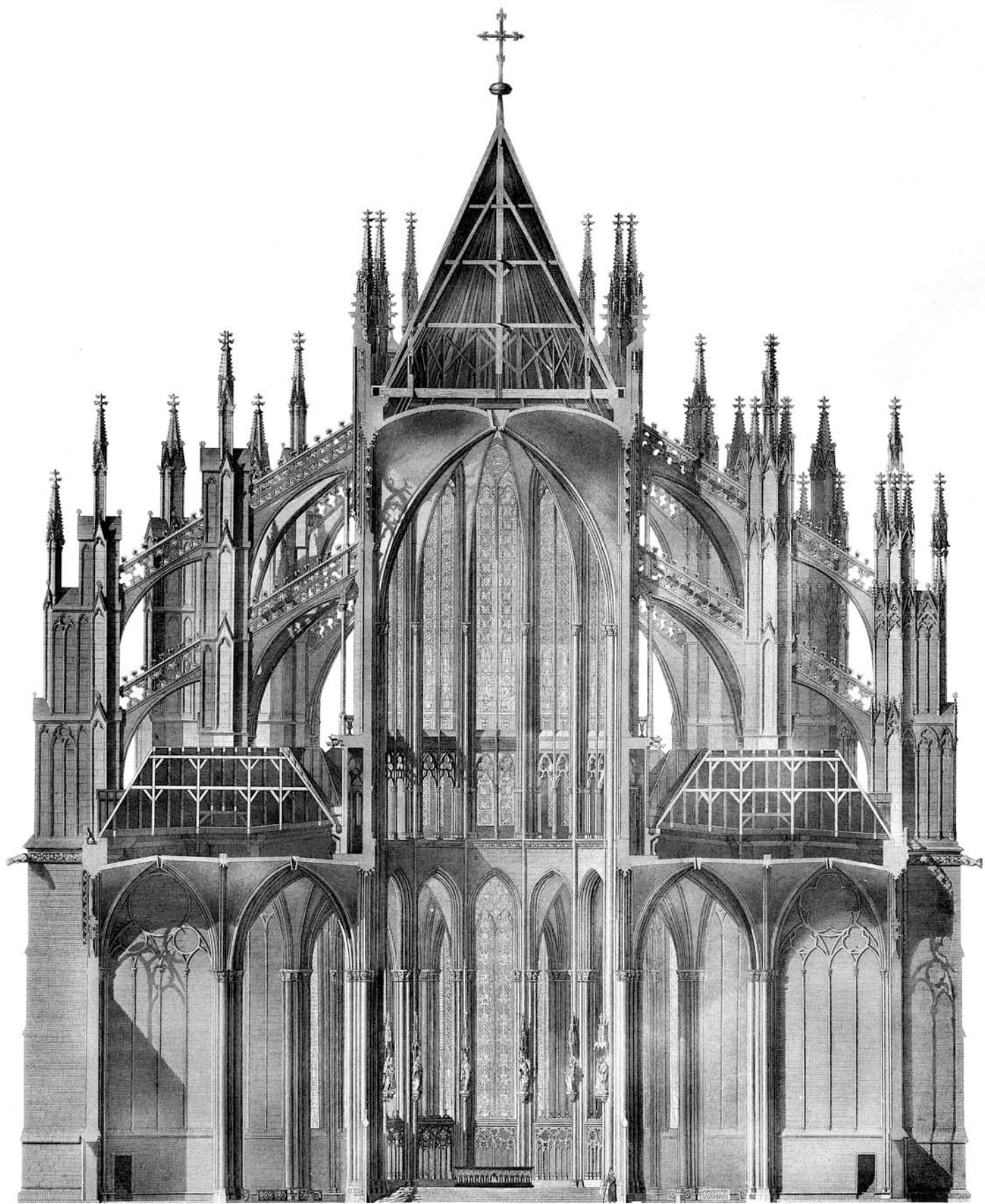
海涅將科隆大教堂看作是禁錮人民的精神監牢，並認為1842年又開始的修建是普魯士反動勢力的復辟和反撲。海涅在另一首政治諷刺詩〈中國皇帝〉中寫道：

作為信仰的象徵和寶藏
那座偉大的寶塔已經落成。⁽²⁾

海涅將大教堂描寫成“塔”，與半個多世紀後康有為的描寫有異曲同工之效，祇不過海涅一直在借中國的皇帝諷刺德國的時政，而康有為祇是在用中國佛教建築“格義”天主教大教堂而已。

二

中世紀末期，農業技術的發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脹，特別是城市的興起，使得處於宗教和世俗壓力下的羅馬教會不得不進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在於從世俗政權手中奪回教會，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系列建立在使徒生活、貧窮及苦修基礎之上的新修會。由於這場運動是在1073年當上教宗的格里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 1073-1085在位)時期進行的，歷史上被稱作“格里高利改革”。在此基礎上，教會是想建立一個現代的、公正的世界。而在技術層面的進步，使得建築領域特別是城市和教堂的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3世紀初科隆被闢為自由市，很快便發展成為了歐洲貿易的中心和當時德國的最大都市。正是由於貿易、手工業以及藝術、建築業的高度發展，行會甚至選舉自己的市長以與羅馬統治者分庭抗禮。而在此之



聖壇截面圖 Max Hasak (1856-1934)

前，科隆地方長期受羅馬文化影響，教堂建築以典型的羅馬風格為主。

13世紀後由於市民階層的興起和政治、經濟的變化，教堂建築的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科隆大教堂之所以選擇哥特式的建築風格，就是因為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建設的。它是在歐洲北部所建造的最大的教堂，其範本是法國蘭斯主教堂(Notre-Dame de Reims)和亞眠主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Amiens)，是德國第一座完全按照法國哥特鼎盛時期樣式建造的教堂。這時期的教堂不僅有建築上的特點，其佔地之大、高度之高，也是之前各個藝術階段的教堂所從未達到的。建築師們甚至在當時數學尚未發展到足以提供精確靜力計算的條件下，發揮德國人特有的精細思維及能工巧匠的智慧，首先通過各種材料的小型模型證實實際建築的可行性。雄偉的規模和令人目眩的高度同樣顯示出建造者的野心。這樣巨大的項目需要投資人，不是教會(兼世俗政府)一方就可以辦到的，因此出資人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科隆大教堂從1248年始建，花了近三百年的時間竟然沒能建成。1517年由於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反對教宗利奧十世(Leo X, 1513-1521)以修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為名兜售贖罪券(indulgence)斂財，而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從而引發了反對天主教的宗教改革運動。科隆大教堂的建設也因此停了下來。直到1842年重又修建，又建了近四十年才得以完成。由於萊茵河谷地地勢較低，一百六十米高的科隆大教堂充分體現了其建築學上的意義：“一覽眾山小”——俯視谷地及周邊環境的效果。

三

本文將依據時間的順序，介紹九位晚清智識分子(也包括當時任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韪良)對科隆和大教堂的描寫，他們的姓名、訪問科隆的時間以及科隆的不同譯名分別為：

序號	姓名	日期(西曆)	科隆譯名
1	張德彝	1866年7月27日	克綸恩
		1877年3月6日	克倫
2	李鳳苞	1878年11月2日	谷郎
3	曾紀澤	1880年7月26日 1880年7月26日	科龍 科倫
4	徐建寅	1880年10月5日	可倫
5	丁建良	1881年6月5日	哥羅尼
6	薛福成	1891年4月6日	果羅尼、寇倫、科隆
7	蔡爾康 (李鴻章)	1896年7月4日	哭龍姆
8	戴鴻慈	1906年3月31日	可倫
9	康有為	1907年1月13日	法論、法論華頓

有關大教堂創建的年代，幾個人的記載均不相同：

丁建良：宋理宗至光緒六年始竣，歷時六百三十二年。按：光緒六年係公元1880年，往上推六百三十二年，大教堂時間的年代為公元1248年，亦即南宋理宗淳祐八年。此記載最為準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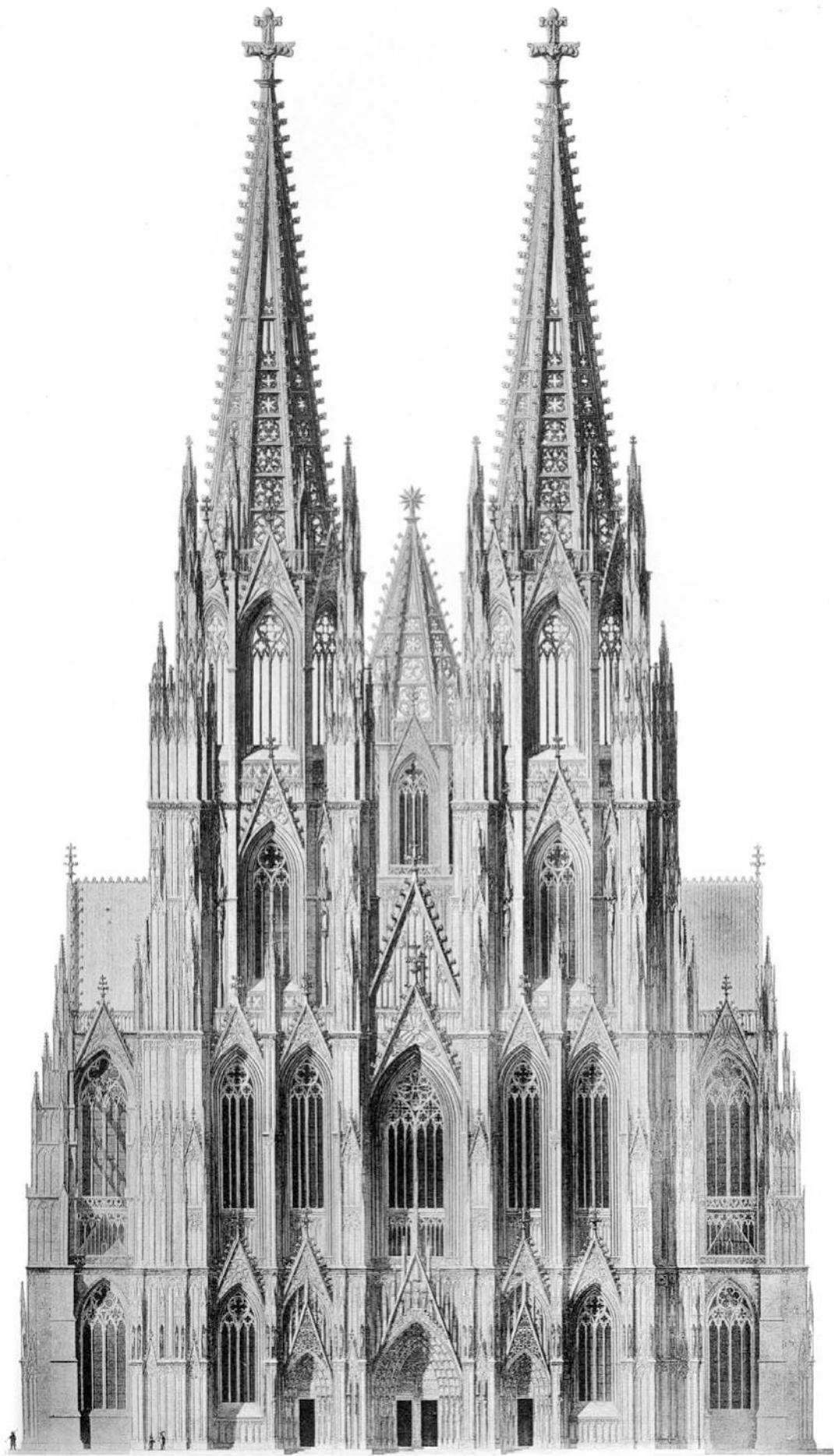
戴鴻慈：始建於公元1278年，至今七百年。按：公元1278年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了，而後推的七百年也是個約數。

康有為：始建於1230年⁽³⁾，同治七年(1868)竣工，康有為稱此教堂“前後凡八百年”，顯然是誇張的說法。他所給出的兩個年代均有誤。

四

科隆大教堂建成之前的記載

——張德彝(1847-1918)在同治五年(1866)隨時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官員斌春以及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遊歷歐洲的時候，僅為同文館英文館的一名學生，當時不過十九歲的年紀。在拜訪過克虜伯(Alfred Krupp, 1812-1887，原文作：克魯蔔)之後，去比利時的路上經過科隆時，由於當時大教堂尚未完



從西面看大教堂雙塔 Max Hasak (1856-1934)

工，他在《航海述奇》“丙寅六月十六日(7月27日)”中僅記載了科隆及其名產——香水：

登火輪車，復西行九百四十三里，戌正一刻至比國界，地名克倫恩，因停車焉。西俗最喜香水，無論男女，浴面後髮內必以香水傾之，沐身後遍體必以香水抹之，以至衣帶巾扇無不濯以香水，借馨香以去邪穢，因而其價騰貴。斌大人與包臘、德善等皆購買數瓶，每瓶價銀一兩五錢，次者八錢，因此地異種香水甲於他國。⁽⁴⁾

實際上，作為大都市的科隆，除了大教堂之外，特別著名的還有那裡的香水。以前我在波恩留學的時候，每次回國給親戚和朋友們帶的常常是科隆的香水。火車站的月臺大廳半圓形山牆上

一面常年是4711牌香水的廣告。據說在拿破崙的軍隊佔領北萊茵地區的時候，科隆的街道都沒有編號，法軍在此被搞得暈頭轉向。為了軍事佔領的方便，法軍指揮官下令對所有房屋進行編號。威廉·繆倫斯(Wilhelm Mülhens)生產香水廠家的門牌號被編為4711，後來香水廠索性就用這個門牌號4711作為香水的牌子。法國人將Eau de Cologne(古龍水，直譯為科隆之水，德語曰：Kölnisch Wasser)帶往法國之後，也將科隆香水的名聲帶到了世界。張德彝乃至斌大人可能並不知道這段歷史，卻一定知道科隆香水之名貴，因此“皆購買數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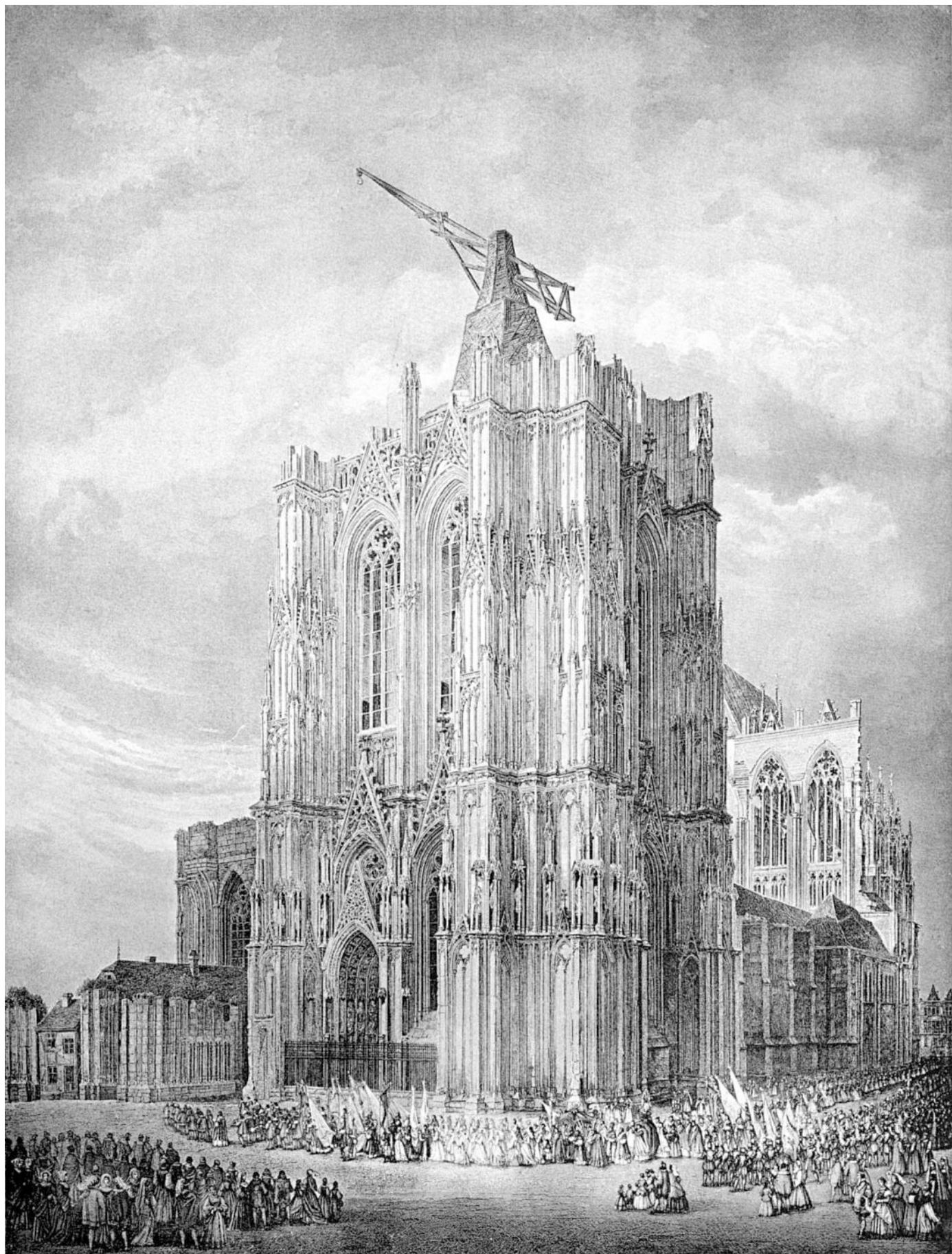
14世紀以來由於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的醫學認為，由於人在沐浴時熱氣會讓皮膚的毛孔張開，因此病氣得以侵入人體。沐浴並且能消耗人的大量體力。因此，其後的歐洲貴族一直認為沐浴有損健康。據說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在七歲之前從來沒有洗過澡。不過，這一時期貴族的“衛生”習慣倒得到了增強，他們會在狩獵出汗後及時更換內衣，在頭髮和身上擦香水來保持清潔。香水正是在16世紀時在法國貴族中流傳開來的。直到19世紀以後，隨着現代意義的衛生觀念的普及，衛生防疫機構的建立，沐浴重又在市民及貴族中得以普及。張德彝對當時歐洲人使用香水的習俗作了描述，除了洗完臉在頭上撒之外，沐浴後也在全身擦，乃至“衣帶巾扇無不濯以香水”，這對於當時很少用香水的中國男性官員來講，無疑是很新鮮的。

光緒二年(1876)冬張德彝隨郭嵩燾(1818-1891)出使英國，任翻譯官。丁丑(1877)正月二十二日(3月6日)張德彝隨郭嵩燾從倫敦赴德時又經過科隆(原文作：克倫城)，提到他第一次隨斌春到這裡的旅行：

東南行一百五十里，西正至克倫城。下車，步入得羅樂店，遇王得勝來迎。此地係前乙丑年隨斌星使到過者。⁽⁵⁾



一位法國士兵在為香水廠家編4711的門牌號——科隆香水包裝上的廣告



建造中的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張德彝的旅行記錄儘管翔實生動，但基本上還是印象式的描摹，沒有進入對自我文化的反思以及中外比較的深入層面。

——李鳳苞(1834-1887)曾任職於曾國藩(1881-1872)、李鴻章(1823-1901)所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局。他曾以經緯線的方法繪製出高品質的地球全圖⁽⁶⁾，其後又被調入吳淞炮臺工程局、製造局譯書館工作，因此他對西方近代工業頗有些瞭解。光緒四年(1878)七月，經駐英公使郭嵩燾(1818-1891)保舉，清政府任命李鳳苞為出使德國大臣，於同年由英國動身，前往德國任職，經由法國、比利時，十月初八日(11月2日)由德國亞琛(Aachen, 原文作：阿欣)入德國境，之後到過科隆：

初八日早三點鐘又上車，五點半到谷郎，晨光熹微，猶耿耿未寐也。谷郎沿來因河西岸，為德國第六通商大城。西曆五十年，紆比安所築。羅馬遷民於此，後為下日爾曼都城。一千二百年時，貿易最盛。一千二百十二年，為自主之城。闕後以油畫著，油畫師蜚侖洛赫奈，馳名於各國。一千八百年時，有教堂二百區，建造甚工。續因民教不和，改教於邦納。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地屬於法。及拿破崙，地入布國。今有民十三萬餘，有兵七百餘。河東為德次城，有民萬餘。鐵道自西北隅渡河而東。過大鐵橋，長四百十二邁當。上層過汽車，下層過馬車，兩旁可步行，俱覓眼鐵柵隔之。橋之兩端，各有國王銅像，為維令一、維令四。⁽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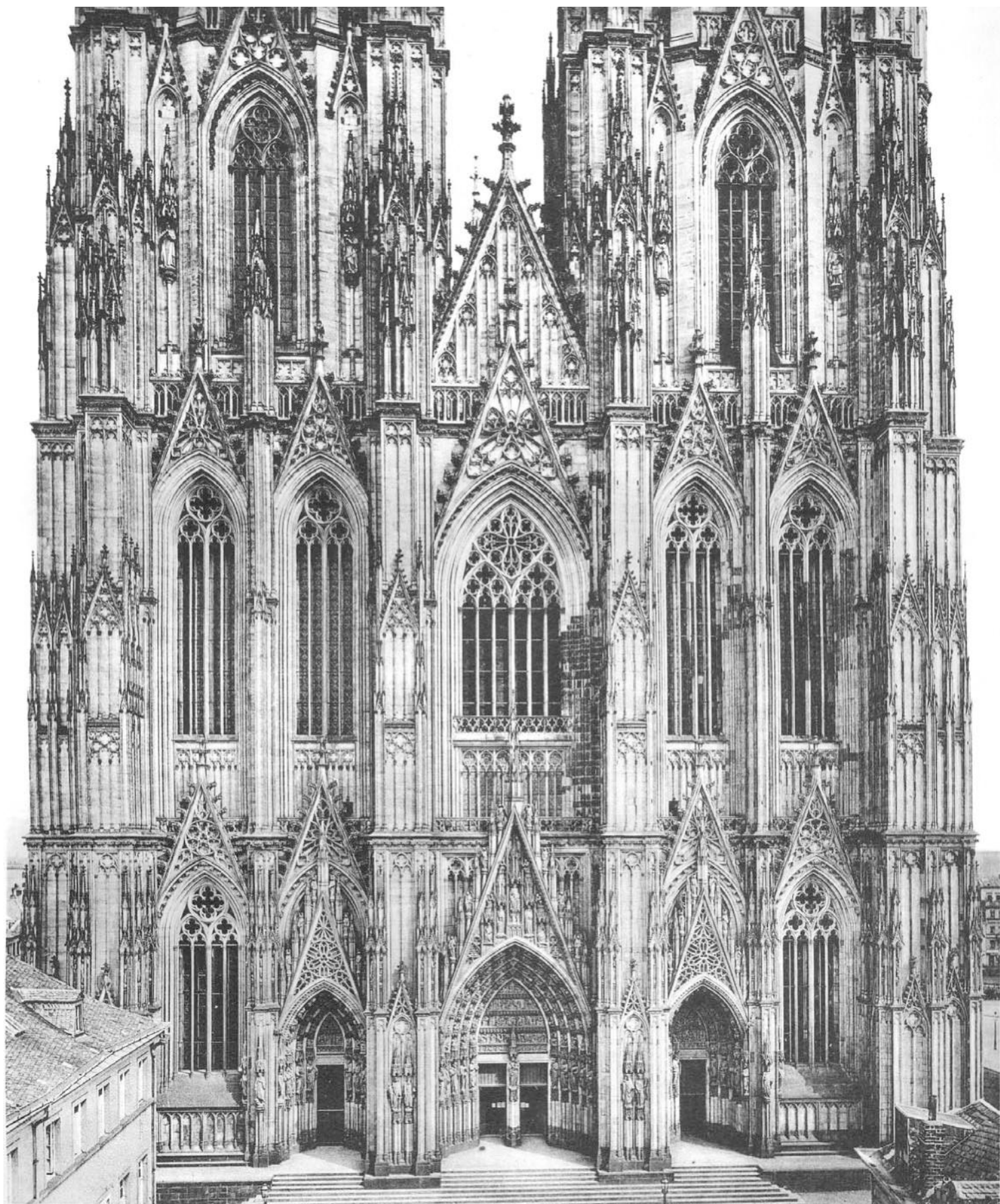
李鳳苞對科隆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述。實際上早在約公元前50年羅馬人在萊茵河右岸、與在左岸的日爾曼部落的烏比爾人(Ubier, 原文作：紆比安)就建立了一座城池。⁽⁸⁾公元50年時，科隆獲得了城市權。後來成為了下日爾曼尼亞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所謂低地國家)的省會。中世紀中期(13世紀)的科隆不僅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由於其貿易日盛，城牆

不斷擴展。到了1225年，科隆城牆之大竟有十六個城門之多，據說超過了當時的巴黎城。李鳳苞所謂的“自主之城”，我想是“自由城市”，是當時直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不屬於任何一個貴族管轄的城市。不過科隆成為“自主之城”的時間並非1212年，而是1475年。

李鳳苞所謂的油畫師“蜚侖洛赫奈”當為15世紀著名的“科隆畫派”的聖像畫家斯蒂芬·羅赫納(Stefan Lochner, 1400/10-1451)，他所繪製的宗教畫精緻絕倫，其中的聖人光采照人。羅赫納掌握了當時所有的繪畫技法：從微型祈禱書上的裝飾畫到科隆大教堂中的巨幅畫作，在技法運用上無不嫺熟。大教堂唱詩班回廊南端的聖母祈禱室(Marienkapelle)牆壁上，可以看到羅赫納1440年的作品：〈國王們的祈禱〉，畫家筆下的聖格利翁(Heiliger Gereon)恬然自若，又略顯驚異之神。羅赫納的許多作品至今都被看作是德國古典畫派的傑作，在科隆以中世紀和古典藝術而聞名的瓦爾拉夫·理查爾茨博物館(Wallraf-Richartz Museum)依然藏有羅赫納的多幅畫作。因此李鳳苞所謂“馳名於各國”並不為過。

科隆一直以來是座以天主教信仰為主的城市，不過自13世紀末以來，由於新興的市民階層的勃興，世俗與教會的勢力一再在這座城市交鋒。我想，這即是李鳳苞所謂“民教不和”吧。由於科隆距離法國不遠，正如李鳳苞的記載，法國大革命後，其軍隊於是入駐科隆，當時整個萊茵河左岸地區完全併入了法國的版圖。1815年科隆被劃給了普魯士(亦即李鳳苞所謂之“布國”)，並且很快成為普魯士繼柏林後第二重要的城市。

李鳳苞所記載的“今有民十三萬餘，有兵七百餘”很能說明科隆這座商業和藝術大都市的特點：崇尚和平與藝術。科隆人熱情豪爽，頗有中國北方人的性格，難怪他們能把狂歡節過得如此認真，且有滋有味。這一每年舉行的盛大天主教儀式，被科隆人戲稱為“第五季”。狂歡隊伍化裝成當年法國軍隊，以調侃法國人，是每年狂歡節的“規定動作”。“士兵們”每兩人在“行



從西面看大教堂（局部） Max Hasak (1856-1934)

軍”幾步後，必要以臀部相互摩擦，以醜化法軍的陣容。因此，我總覺得科隆人的“文弱”有點類似中國的宋代，實際上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是被科隆人作為解放者擁戴而入城的，因為這裡的商人中有很多是被歧視的猶太人和新教徒，他們歡呼法國人來拯救他們。

李鳳苞提到萊茵河上的鐵橋是連接德伊茨(Deutz，原文作：德次城，原本在萊茵河右岸的獨立城市，1888年併入科隆市)和科隆之間的霍恩佐羅姆大橋(Hohenzollembrücke)，他所說的“汽車”實際上是今天的火車。橋頭的兩座騎士般的銅像是威廉一世和四世。實際上，威廉四世(Wilhelm IV, 1795-1861)是普魯士國王(1840-1861在位)，而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是他的後繼者，曾為普魯士國王(1861-1871)和德意志帝國皇帝(1871-1888)。由於當時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緣故，“皇帝”一詞是有特定的所指，他們一般稱德國皇帝為“開色”(Kaiser的音譯)⁽⁹⁾。而李鳳苞則直接稱這兩位為“國王”。

相對於其他人的遊記，李鳳苞的記載還是比較準確全面的。我推測這些內容是從當時的英文遊覽手冊上翻譯而來的，因為如若不依據某本書的話，其中的一些年代很少有人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曾紀澤(1839-1890)在國外曾做過八年多的公使(1878-1886)，被認為是在清代外交史上少有的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多失敗和屈辱的外交官。光緒六年(1880)六月二十日(7月26日)曾紀澤在從比利時去德國的路上經過科隆，儘管是在早晨(辰正)，不過他也沒有出站參觀即將竣工的大教堂：

辰正，抵德境科龍。至車棧浣饋。茶食後，因德國稅官查閱行李，將督僕從開篋示之，而稅關見英人傳澧蘭、阿爾科克寫寄英國住俄公使之函，知余奉使入俄，遂免查驗。⁽¹⁰⁾

光緒七年(1881)潤七月二十日(9月13日)再回巴黎的時候，曾紀澤重又經科隆，也同樣沒有出站去參觀已經落成近一年的大教堂：



威廉四世 Max Hasak (1856-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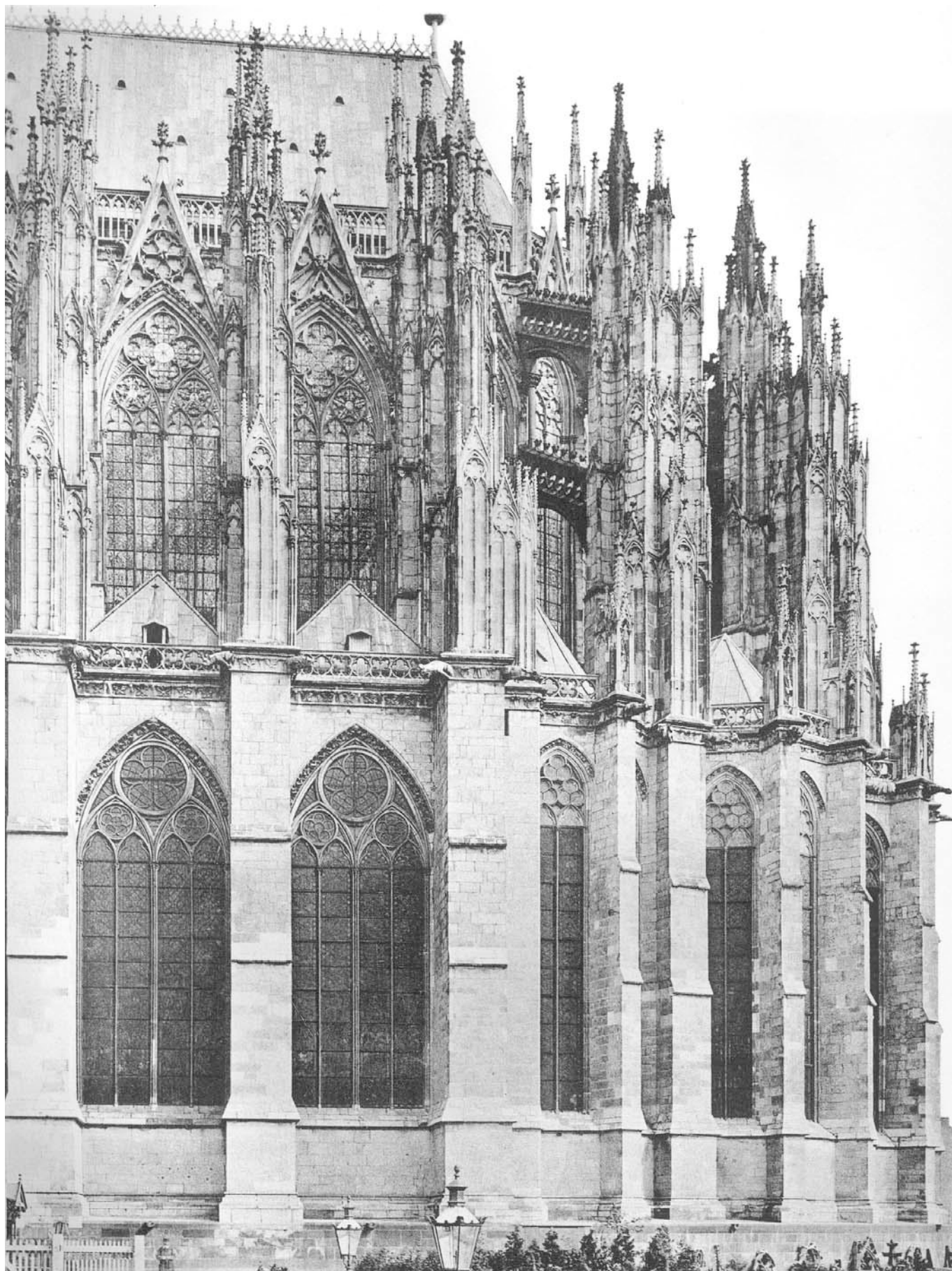
酉正，至法界科倫。飯後，靜坐候車。亥初登車，亥正展輪，安置行李。子初睡。⁽¹¹⁾

曾紀澤是晚上到了科隆，夜間離開的。在當時他很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作為文化大都市的科隆，以至於他來回兩次經過此城的時候，甚至將該城的名稱音譯成不同的漢字。

五

科隆大教堂建成之後

——作為由李鴻章派往德國考察兵工、機械、化工的技術專家，徐建寅(1845-1901)的另一個主要使命在於購買德國的鐵甲兵船，因此他對科隆大教堂的記載極為簡略，儘管教堂在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的大筆投入下，於1880年得以建成，而正是在建成前夕，徐建寅路過此地。他在光緒庚辰(1880)九月初二日的日記中寫道：



教堂聖壇南牆 Max Hasak (1856-1934)

十一點鐘到可倫。一點鐘往觀禮拜堂，前有雙塔，高五百四十尺。此堂係五百年前創建，今始落成，木架尚未全拆。聞德皇將於十日後親臨，行落成禮。⁽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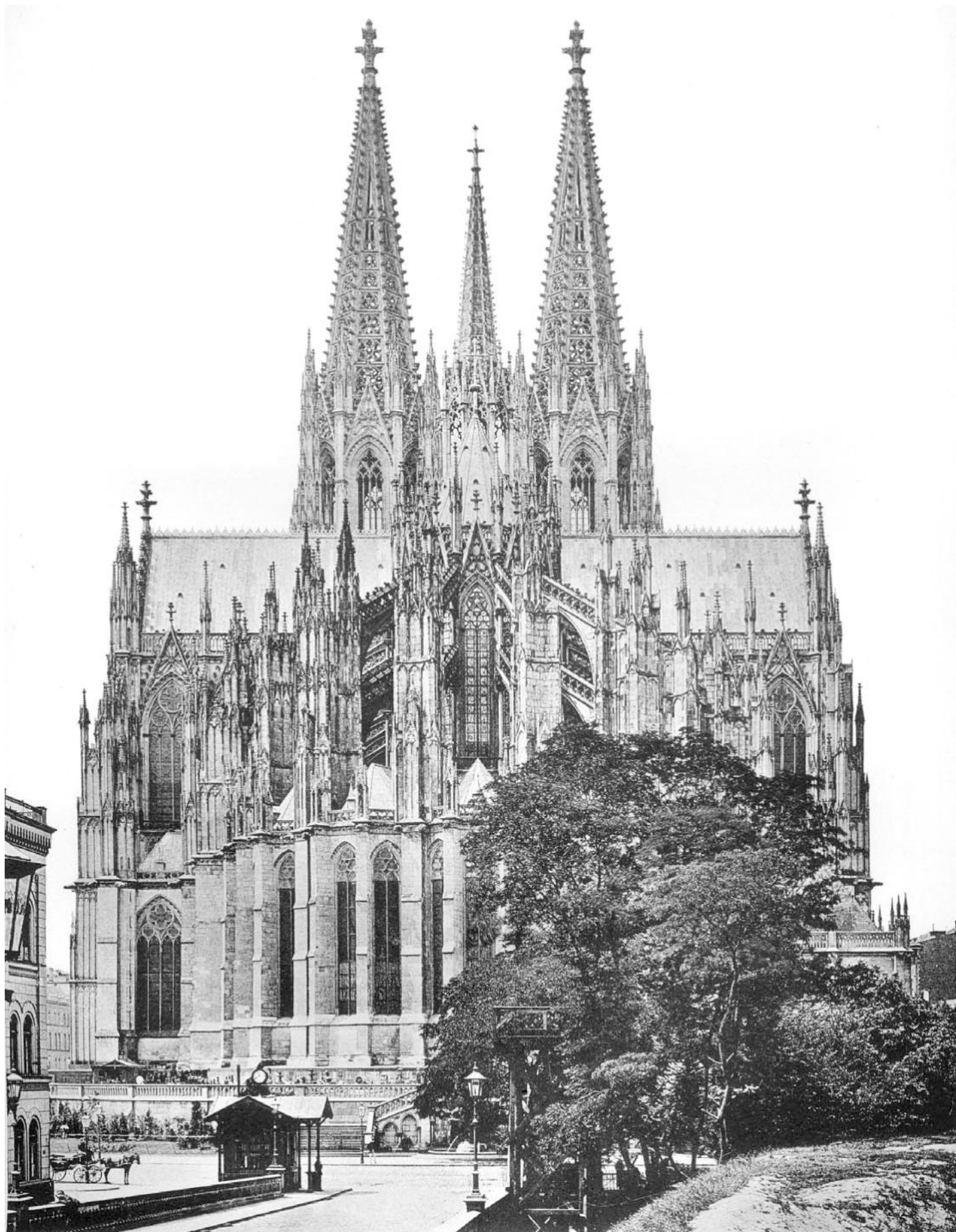
1880年10月15日，這座經歷了幾百年的宗教建築舉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禮。而庚辰九月初二日係陽曆10月5日，距離慶典的確僅有十天的時間。這裡的德皇當然是威廉一世了。不過，徐建寅的興趣完全在科學方面。他在《歐遊雜錄》中對德國以近代工業為基礎的工廠進行過系統的考察，有幾十個之多。他甚至在參觀完柏林某觀器廠時，見到用車床車削銅球的方法很好，當即手繪了一張圖樣。⁽¹³⁾正是由於這種精心的考察，徐建寅建議在德國訂購兩艘軍艦，亦即後來的“定遠”和“鎮遠”兩艦，成為了當時北洋艦隊的主力艦。徐建寅是比較典型的“技術決定論”的學者，認為現代工業和軍事是可以救國的，而在歐洲歷史和藝術方面，他的興趣明顯不大。

——美國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在擔任同文館總教習期間，1880年趁他回美國探親的時機，清政府准他一年的假期，回美國探親，總理衙門同時也命他利用此次的機會考察歐美的教育制度。回北京約半年後，丁韞良提交了此行的考察報告：上下兩卷本的《西學考略》。書中講述了他從法國經比利時去德國的經過，在經科隆(原文作：哥羅尼)時對大教堂進行了具體的描述。光緒七年(1881)五月初九日(6月5日)晚丁韞良從亞琛(Aachen，原文作：艾克斯)抵科隆在描寫教堂之前，丁韞良首先用幾句話交代了科隆建城的歷史：

是晚抵哥羅尼，譯其義為“駐防”。蓋漢時，羅馬初征服德國，建城設兵於此城，臨連那江(又作來因河)。帆檣林立，往來甚夥，貿易亦頗繁盛。然城中可觀者，惟教堂一所。⁽¹⁴⁾



內士戲院：新城市劇院，來自老明信片。



聖壇外牆 Max Hasak (1856-1934)

也許是因為丁韞良是美國人的緣故，他在晚清赴德考察的官員中，是第一個對“科隆”字源進行解釋的學者。實際上，科隆的德文名稱為：Köln（1919年以前寫作：Cöln），而丁韞良的譯名“哥羅尼”顯然來自科隆的英文名：Cologne，而英文名有來自拉丁語的名稱：Colonia，意為殖民城市。在當時可能是沒有“殖民”一詞的緣故，丁韞良將此詞勉強譯作“駐防”，引申為羅馬人駐防之地。

丁韞良從教堂的材料、尺寸、外形等外部形制寫到內部的藻井、石柱，非常詳細：

堂以石建，上矗五塔，高者五十餘丈，堂長四十四丈，寬、高各十五丈。由堂外觀，如磊石山，即而視之，門牆窗牖，雕鏤精細，殆如鬼斧神工（俗傳□造之初，有鬼神獻圖）。堂頂蔚藍色，貼以金星，入夜觀之，令人疑與彼蒼相接也。柱四行，每行十數根，周約四五丈。窮極刻工，酷肖天產樹木，仰而瞻之，有如枝柯高結。下為複道，而以柱作盤錯，形蓋會意於山林也。⁽¹⁵⁾

科隆大教堂的建築，使哥特式發展到了極致。雙層石刻的窗花圖案各不相同，而又重疊在一起，玲瓏剔透，這便是丁韞良所提到的“門牆窗牖，雕鏤精細”吧。之後丁韞良又對大教堂的歷史作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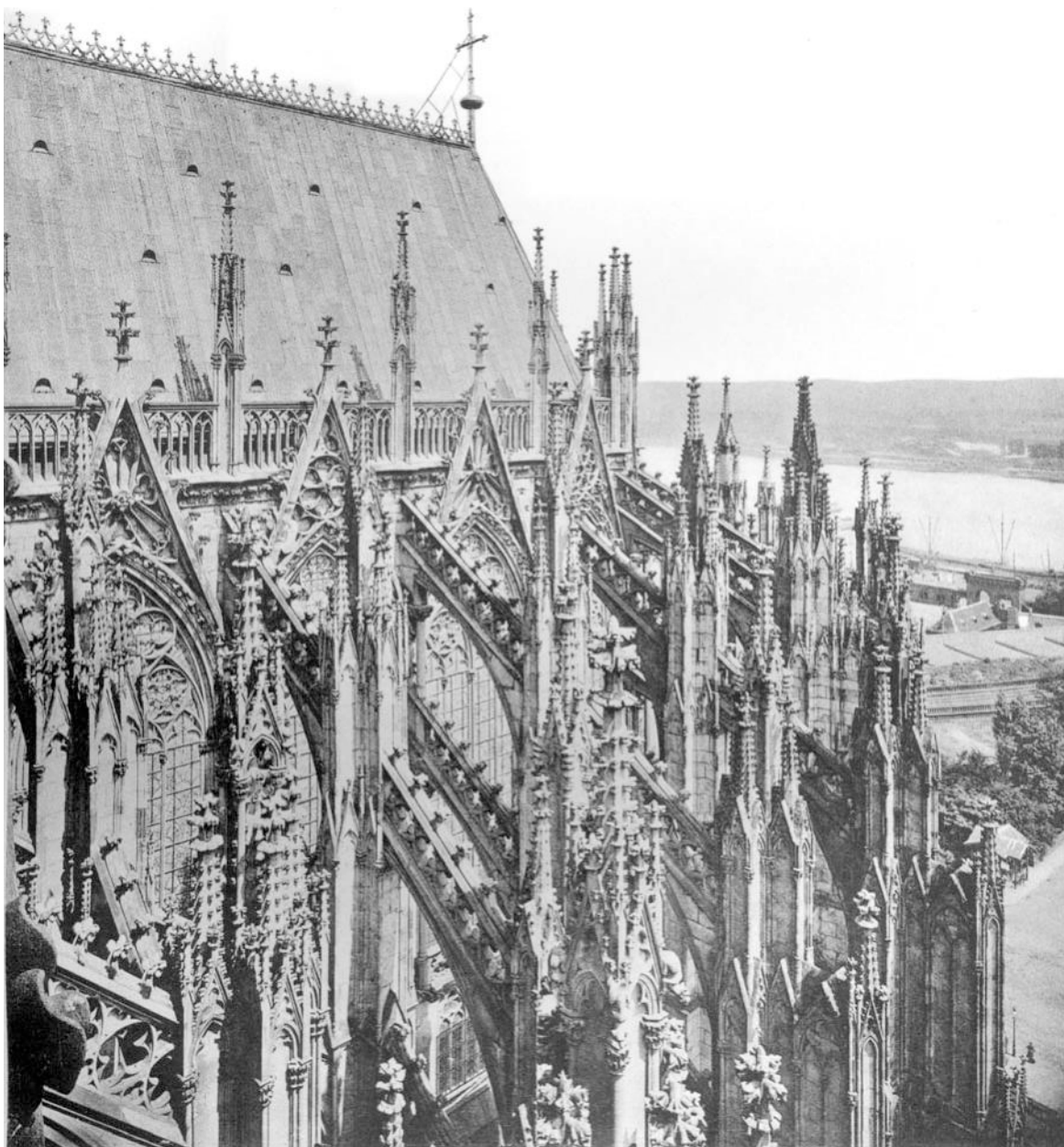
是堂創自宋理宗時，至光緒六年大工始竣（歷時六百三十二年）。德國君後乃大興崇禮，以慶其成。（泰西各國堂宇均築以碑石，式分二類：一倣羅馬式，一倣德國古式，故名為古德式。古德式門窗以雙圓弧相交為之；羅馬式門窗以單配弧為之。此則門窗高而窄，堂中□黑，宜於祠宇。彼□門窗，高而大，室內光明，宜於宮



從北面看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教堂中廳 Max Hasak (1856-1934)



聖壇南面的扶垛 Max Hasak (1856-1934)

殿。古德式以哥羅尼教堂為天下第一。)各國不遠千里而來觀者，每日不下數百人。而余繞道入德國，亦僅千里既可觀瞻，又豈得憚其跋涉耶？⁽¹⁶⁾

丁韞良非常清楚地講解了歐洲教堂羅馬式和哥特式的特點：他所翻譯的兩個名詞都很有講究，因為“倣羅馬式”（現在翻譯成“羅馬式”或“羅曼式”）並非羅馬建築風格的翻版，而是

在11-12世紀，歐洲一些教堂建築着意模倣了古羅馬建築式樣，特別是採用了拱券結構而建成的教堂，故名。在羅馬式建築中，採用最多的是半圓拱、十字拱的形式，採用骨架券代替拱頂。羅馬式的建築巨大而厚實，小圓窗（所謂“牛眼”）窄小，除了建築上的承重的功能之外，當時也是為了造成教堂內部神秘的感覺。哥特時期的建築風格，由於採用了尖肋拱頂，頂的高度和跨度不再受限制，因此教堂的窗戶既高且大，窗櫺的構



聖壇及彩色玻璃窗 Max Hasak (1856-1934)



聖壇頂 Max Hasak (1856-1934)

造工藝精巧，配以玻璃拼成的五彩斑駁宗教畫，一改羅馬式教堂內陰暗、壓抑的氣氛，給人以明亮的感覺，表達了對天國的嚮往。而哥特式被丁韞良譯成了“古德式”，他的解釋是“倣德國古式”，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哥特式”(Gotik)一詞的來源的確是與古代東日爾曼部落的“哥特人”(Goten)有關。儘管這一藝術風格是在12世紀的時候起源於巴黎附近地區，瓦薩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卻將這一藝術風格貶低為“哥特人式的”，意思是“野蠻的”、“不入流”的，但“哥特式”一詞卻流傳了下來。從語源學的角度可以說“哥特式”跟“哥特人”有關，但真正從建築風格上來看，實際上並沒有甚麼關聯。

從丁韞良的描述中可以知道，科隆大教堂在當時已經成為了著名的遊覽勝地：“各國不遠千里而來觀者，每日不下數百人”，我想除了哥特式的建築外，很多天主教徒也是由於這裡供奉着裝有“東方三聖王”遺骨的金匣子而前來瞻禮的吧！

——作為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大臣，薛福成(1838-1894)在光緒十七年(1891)二月二十八日(4月6日)在從德國回法國的途中經過科隆，僅記載了其地理位置和轉車的情況：

亥刻四十五分，至果羅尼(一譯作寇倫，又作科隆)，地當水道，水陸交衝(濱萊因河)。德法兩國鐵軌不同，於此必換車焉。(17)



聖壇 Max Hasak (1856-1934)

當時德法之間鐵軌的軌距不同，有點像今天中國和俄羅斯、蒙古的情形。據坐過中俄/中蒙列車的朋友們講，他們乘坐的列車在滿洲里或二連浩特要進行換輪。祇不過薛福成時代在科隆下了德國的列車直接換成了與德國軌距不同的法國列車，而現在是將車廂吊裝至各自規矩的車輪上而已。儘管此時科隆大教堂早已落成十餘年，薛福成僅在此轉車，並沒有關注科隆及大教堂的情況。

——在晚清著名報人蔡爾康(1851-1921)等著的《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中，記載了李鴻章在埃森(Essen，原文作：遏森)拜訪過克虜伯之後前往荷蘭(原文作：和蘭)的途中，於光緒廿二年(1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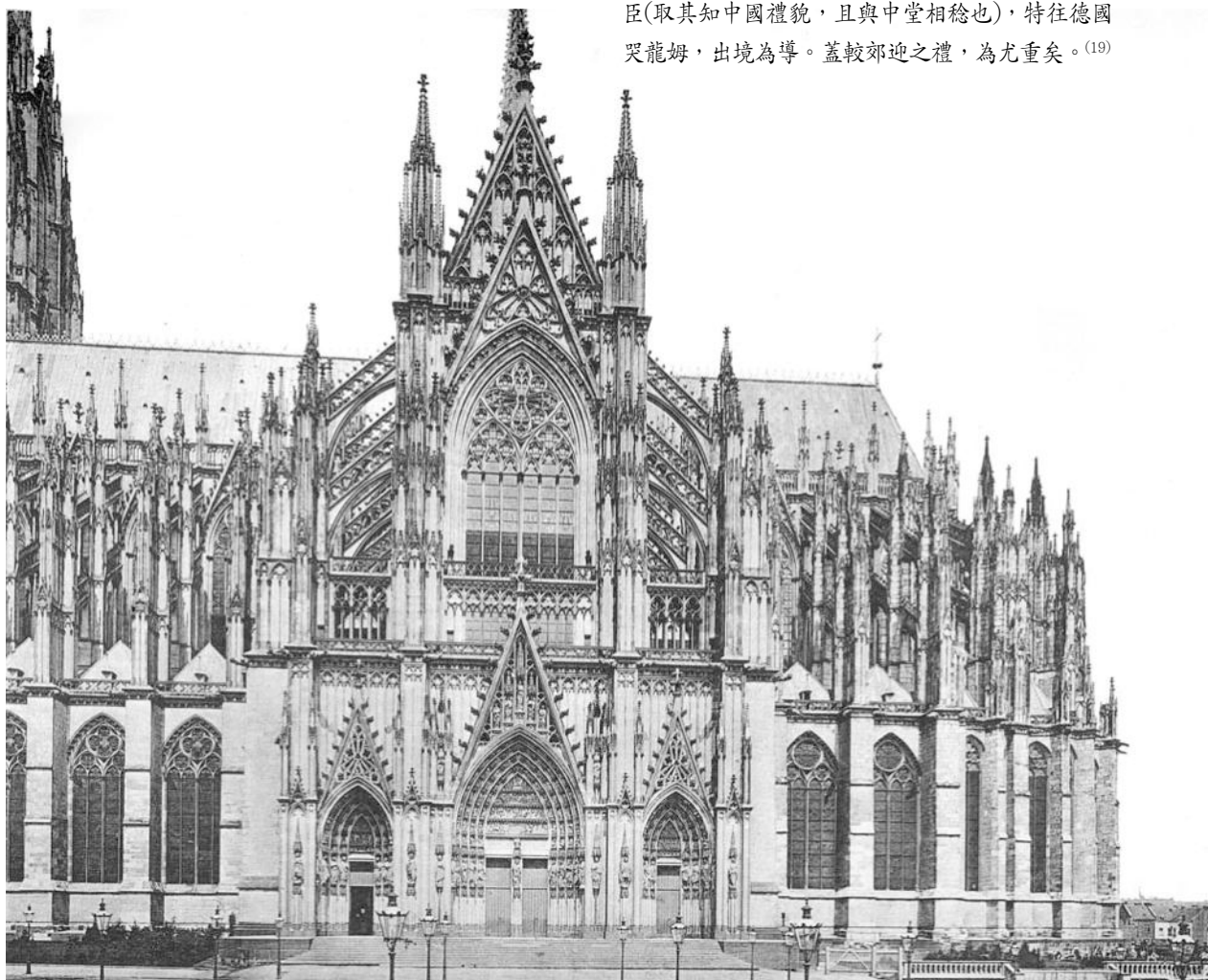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四日(7月4日)經過科隆(原文作：哭龍姆)時的情景：

中堂至哭龍姆，將出德境矣。地方官會同紳董及製造廠總理人，盛服郊迎。(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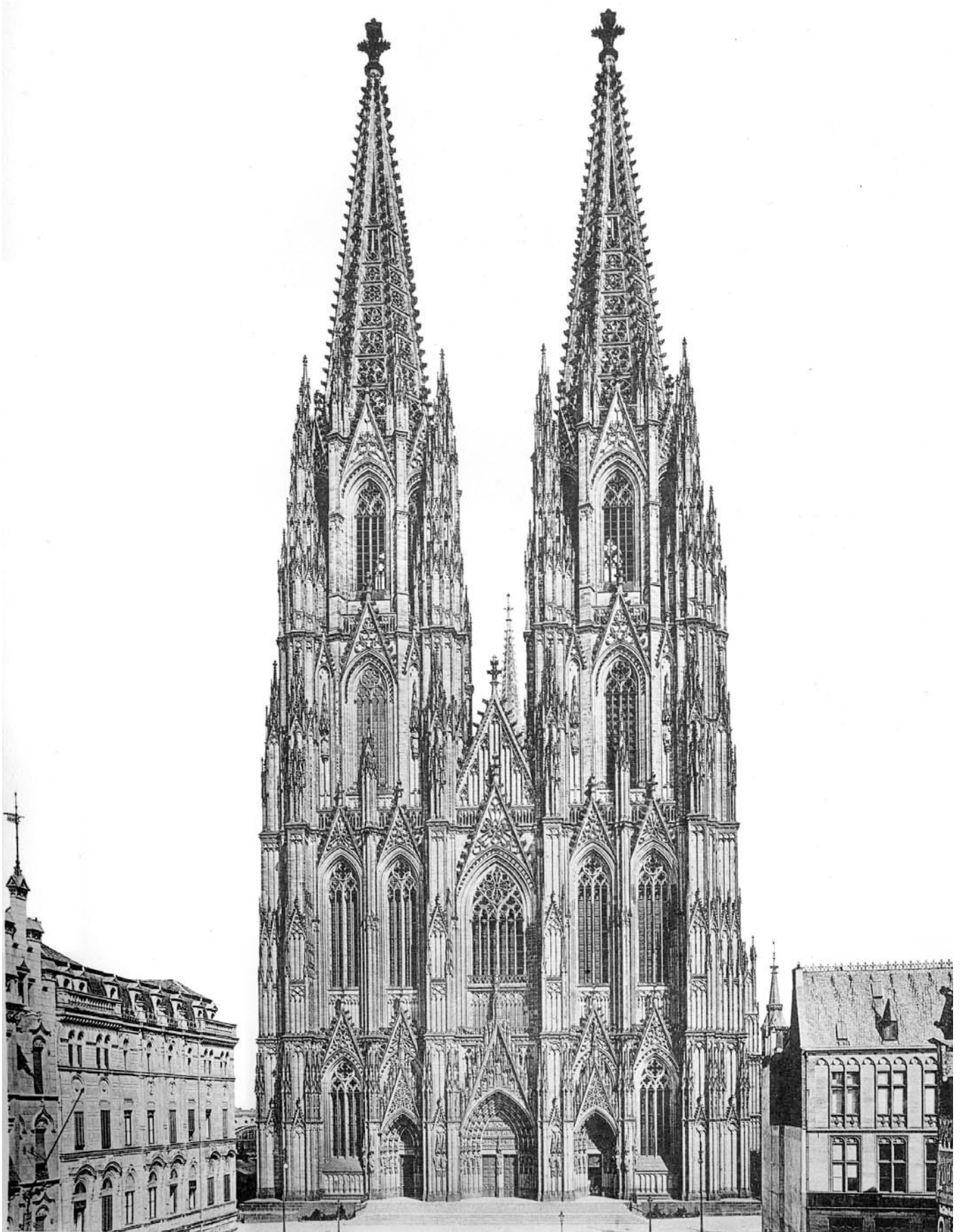
遺憾的是，沒有具體記載李鴻章參觀科隆大教堂的盛況。

另據《和輶小志》記載：

五月二十四日(西七月四號)，李中堂率諸隨員，自德意志而至和蘭(或作荷蘭)，即入海格都城。初，和蘭王聞中堂將至，先遣使中華之璫鉢大臣(取其知中國禮貌，且與中堂相稔也)，特往德國哭龍姆，出境為導。蓋較郊迎之禮，為尤重矣。(19)



南門 Max Hasak (1856-1934)



從西面看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李鴻章參觀完科隆後，直接去了荷蘭，因為荷蘭國王派前任駐華大使前往科隆迎接。

——清政府為應付方興未艾的立憲呼聲，特別安排了著名的“五大臣出洋”到歐美考察政治。戶部右侍郎戴鴻慈(1853-1910)為五大臣之一，出使美、英、法、德、丹麥、瑞士、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這次的出洋讓戴鴻慈大開眼界，認為中國祇有改革、立憲的道路才有出路，主張以立憲政體代替專制政體。戴鴻慈於丙午(1906)三月初七日(3月1日)經過科隆，並對科隆做了描述：

九時五十五分，至動物園(Zoologischer Garten)車站登汽車往可倫(Köln)城，十時三十五分到，入寓德姆客棧(Dom Hotel)。可倫為西方一大都會，街衢寬廣，工商繁庶，人口約五十萬，客棧亦宏敞殊常，風景不亞柏林焉。(20)

戴鴻慈是唯一的一位在他的遊記中附註了德文原文的官員，儘管這些原文中有一些錯誤(引文中已經更正)，但至少說明他具有這方面的意識。此外，戴氏也不再像其他官員一樣用傳統的地支計時了，而採用了西方的計時方式。我想，這些都可能跟他銳志革新有關。他們所住的酒店 Dom Hotel 係為大教堂正門(西門)對面的“大教堂酒店”。從戴氏對科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對這一城市非常喜歡。

第二天(初八日)戴鴻慈從艾弗爾山地區(Eifel，原文作：埃菲爾)參觀完水電大壩之後，又回到了科隆。當天晚上應市長的邀請在“新市歌劇院”看了一齣歌劇：

夜，府尹邀往內士戲園(Neues Stadttheater)觀劇。此院地甚博麗，與巴黎國家戲院相等。樓分四層，觀者甚眾。是夜所演，無甚可觀，而佈景之工，乃其能事。十一時三十分回寓。(21)

相當於副部長的戴鴻慈自然會受到科隆市長(府尹)的招待，他們所去的“內士戲院”實際上是1902年建成的“新城市劇院”，從今天留下的照片可以知道是新巴羅克和威廉二世式的風格。據說這個劇院可以容納一千八百名觀眾。可惜在1943/44年的大轟炸中，“新城市劇院”遭嚴重破壞，後來沒有重建。初九日戴鴻慈參觀了科隆大教堂：

三時，出觀大教堂，此歐洲第二大教堂也，在本店之前，高四十丈，崇麗莊嚴，規模特異，構以白石，遍刻名像。在法國，古教堂亦有似此者，然彼第三間，此則五間，殆無其偶云。建於一千二百七十八年，至今七百年矣。中有寶物室，所藏多遺物、古器之關於宗教者，如十字架之屬，嵌以珍珠、寶石或刻象牙，類十八、九世紀物也。又有臘丁文古籍，有羅馬皇諸像。主教導觀甚殷勤。(22)

在戴氏的描述中，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大教堂“構以白石”——亦即磨光的大理石。據說大教堂共使用了十六萬噸這樣的石塊，由於周圍的地區並不出產類似的石頭，很多是從不同地區徵集而來的。海涅在他的詩中曾對此加以諷刺：

科隆的教堂不能完成，/雖然有史瓦本的愚人/為了教堂的繼續建築，/把一整船的石頭輪運。(23)

遙想教堂建成的當年，在沒有被污染的湛藍和清亮的天空掩映下，白色的磨光大理石，如石筍一般矗立在教堂之頂，一定會感到精緻剔透而又蔚為壯觀。而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卻是一座黑乎乎的龐然大物，與其說是莊嚴、肅穆，不如說是一種被壓抑的感覺。這是由於一個多世紀以來，工業污染的結果。其二是他提到的科隆大教堂的五進的形制，這在教堂的建制中確實不多

見。一般的教堂，其長廊常為東西三進，與南北向的橫廊相交於聖壇，成為十字架的形狀。科隆大教堂的平面圖雖然也是呈十字架形狀，但長廊的寬度和高度也同時得到了增加，這等於加大了教堂主禮拜堂的空間，高聳的石柱、精緻的尖拱頂，讓進入的人們為其高曠的氣勢所震撼。其三是科隆大教堂中的宗教聖物，據戴氏推測是18-19世紀的遺物，實際上，不論是聖壇上裝“東方三聖王”屍骨的金匣子，還是其它如十字架、《聖經》等各種基督教飾物，大都是中世紀的文物。

對於中世紀的城市來講，最重要的莫過於大教堂、大型市場和市政廳了。除了大教堂之外，戴鴻慈還參觀了當地的市場：

觀本城市場。此市場面積甚廣，四面憑樓，下有地洞，計買地之費三百五十萬馬克。蓋以地居城之中央，四面皆來此買賣，故地價甚貴也。凡魚肉、蔬果、餅餌之屬，分別陳列。租地設售者，每一平方尺納金六十分尼，此以日算。以月算，則每日四十分尼而已。此種稅金，每年以百分之七補回買地修建之費，約十餘年即可清完云。廠中經理官凡二十四人。地窖皆冰房也，需冰物者，納租三十馬克至五十馬克。所藏之冰，有最冷至寒暑表五度以下者，蓋藏肉之地如此。其藏果瓜等屬者，以次少減，以不如肉之易壞故也。觀造冰室、機器房。(24)



從南面看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戴鴻慈對科隆市場的描寫也很有特點，他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賣甚麼，而是市場的位置、地價、稅金以及管理的情況。同時他也很關注用於冷藏的造冰工藝，參觀了市場的相關設施：造冰室、機器房。實際上，戴鴻慈的主要興趣是對德國的近代工業方面，因此他也在科隆特別參觀了當地的職業學校(工藝學堂)：

此特立之職工學堂也，小學校卒業後入之。生徒二百三十九人，教員十六人，學費每半年人納一百馬克。學費不足，則由公家助之，一年約十萬馬克。學科凡十六門，以肆八門者為合格。觀大會堂、教室、畫圖室、藏書室。六時，回寓。夜八時，府尹伯克福(Becker)邀飲公署。署，五百年舊築也。同席四十人。府尹演說致頌，午帥答之。十一時三十分歸。⁽²⁵⁾

有關德國的教育制度(也包括職業教育)，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大德國學校論略》，1873)和丁韞良(《西學考略》，1882)曾經向中國知識界系統而詳細地介紹過，不過真正到德國考察其職業教育的政府官員，戴鴻慈可謂是為數極少的先驅者之一了。他對職業學校學生數、教師數、學費、國家投入、科目以及學校的設施都作了記錄。後來康有為在考察德國的教育時也指出：“德國學之尤有實效者，尤在實業職工學也。”⁽²⁶⁾上文中的“府尹伯克福”係當時科隆的市長威廉·貝克爾(Wilhelm Becker, 1835-1924)，他在1886-1907年間出任該市市長。不論從戴鴻慈系統地對德國制度的理性考察，還是對旅行中所見所聞的記錄，處處都體現了他認真貫徹執行清廷“擇善而從”的態度。

——對大教堂記載最清楚的要數康有為(1858-1927)了。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國外。光緒三十年(1904)初夏，他從香港出發，經印度洋入地中海，作歐洲十一國旅行。在流亡歐洲的歲月中，康有為曾九次遊歷德國，除了較長時間居住的瑞典外，德國是他去過次數最多的國家。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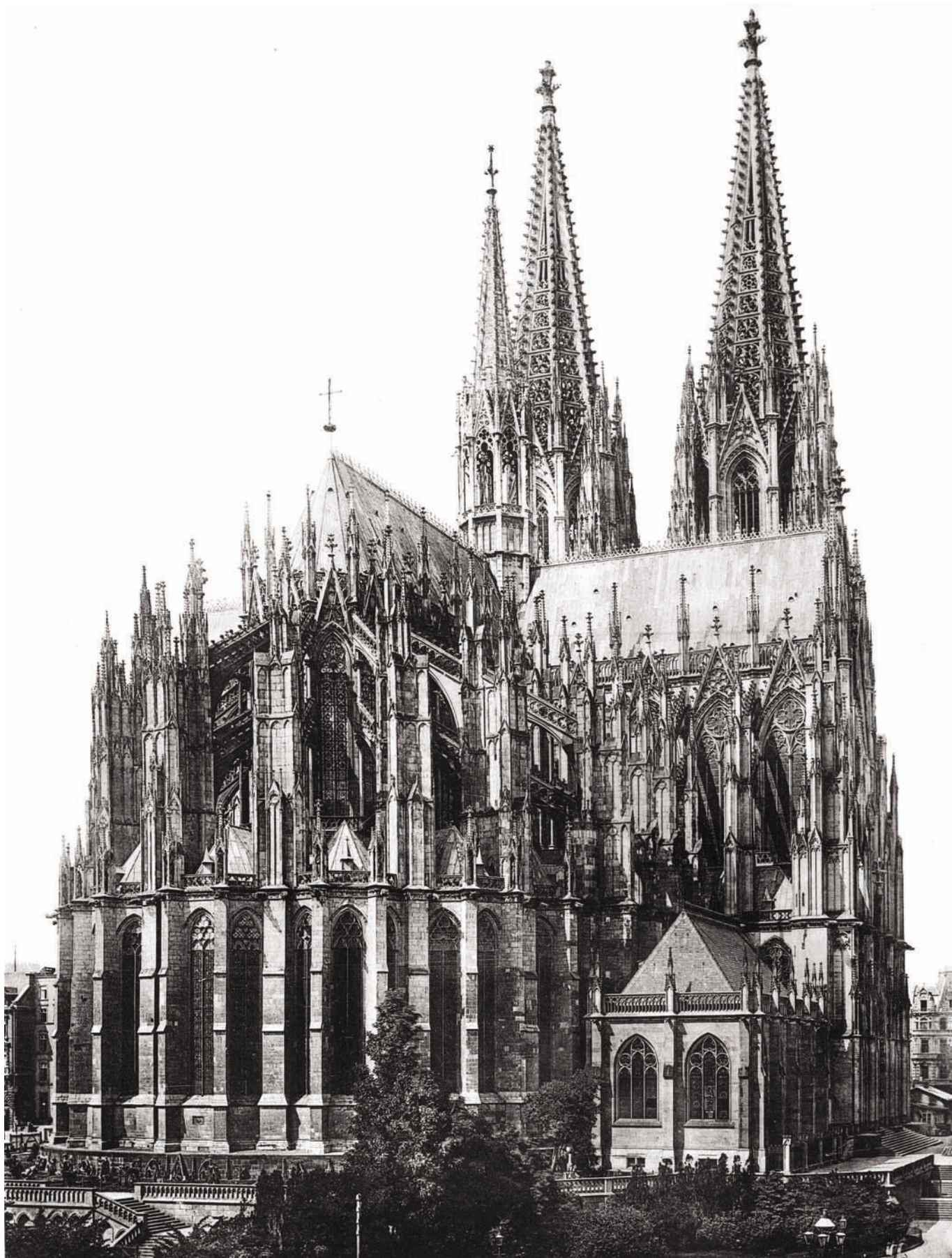
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日(1907年元月3日)自瑞典行，二十九日(元月13日)到了科隆(原文作：佉論)。有關科隆的基本情況，康有為介紹道：

佉論(英音也)，德音曰佉論花頓，以製花露水著，即以為名，德西邊第一大市也。故自立國為普所滅，人口五十萬，臨來因河曲，北通荷，西通比、法，轉輸利便，自古為雄鎮。大道廣潔，幾能比柏林之靈頓街。蓋自羅馬開闢至今，羅馬古城門猶存，築以小石頗奇。又有十二紀之古城，周環木，後列石像，形制甚詭。河幹大道，有威廉父子像。戲院壯麗，所費至六百萬。河上橋橫，皆以鐵柱承之，可開合。公園廣大森尉，中有樓閣，一雜貨店，女工三百六十。雕飾詭異，各都會所無。客店佈置陳設，亦復古雅奇詭。信乎都會之繁麗富靡，而德人之心思，善於製作，即此亦為各國所未及也。⁽²⁷⁾

有關科隆的譯名，千奇百怪，也是因為科隆的德文名和英文名不一樣的緣故。而康有為所謂：佉論，英音也；佉論花頓，德音，實在不知道出處何在。接下來康有為也談到了科隆的特產：香水(花露水)，並對科隆的基本情況和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康有為認為作為大都市的科隆，幾乎可以跟柏林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原文作：靈頓街)相比美。不過，科隆的歷史要比柏林悠久得多。所謂的威廉父子像當為霍恩佐羅姆大橋橋頭的威廉四世和一世的騎士像，康有為同時提到了戴鴻慈也描寫過的建於1902年的“內士戲院”(“新城市劇院”)。然而大部分來科隆的人，大都為大教堂所吸引而來：

然佉論所以著名，與各國遊客展齒所走集者，則不以其都邑之盛，而皆以其塔寺來也。⁽²⁸⁾

接下來康有為對大教堂的歷史和內部的形制作了描述：



從北面看大教堂 Max Hasak (1856-1934)

法論之塔寺，為大地建築工程久遠之第一。自西千二百三十年，當宋理宗時創建，至同治七年乃落成，前後凡八百年，故為驚人之絕作。苟非教力之綿長，封建之大力，必不能得此。雙塔杳杳入雲，高百六十八邁當，蓋當中國四百有六尺六寸。頂之相輪，亦高十餘丈。八百年工程久遠，實冠宇內，可為獨奇。全祠巍巍如山立雲聳，高十餘丈，長廿餘丈。殿前座作圓壁式，左右五間，前列龕燭，左右兩高座長十丈許。設燈甚多，高處供多像，柱及半皆作立像。每二柱，間作一戶，上作四戶，再上數丈，以五色畫玻為之，極瑰麗。堂上深四柱，每柱距二丈許。入門三層，大柱以三十八柱合作一柱，大至丈許，左右深列十柱，亦皆以十餘稜作一柱，每柱二列九戶。壁列像於中層，右作樂管極巨，藻井作大交文式十，繪紅白二色，白灰飾頂，峨特式皆如此，遍遊意、班皆然。⁽²⁹⁾

除了對科隆大教堂記載的幾個歷史資料均不準確外，其餘有關教堂內部的描寫，也大都得自於自己的觀察。康有為對“頂之相輪”的觀察非常獨特，因為仰望時，“相輪”僅為一個小點而已。幾年前科隆人為了證明教堂之雄偉，專門在大教堂前做製了教堂塔頂的十字花(相輪)，並加上了中文的說明：此十字花高9.50米，寬4.60米。由於在遊歷德國之前，康有為已經去過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對於哥特式(原文作：峨特式)的教堂建築風格並不陌生，在此他特別強調了高大的窗上用彩色玻璃鑲嵌出的圖畫以及精緻的拱廊式的屋頂。有關大教堂內天主教的禮拜儀式，康有為也作了描述：

設拜幾甚多，有警儀者，紅袍持杖巡察，以糾喧嘩，禁閒遊者。大僧誦經於壇上，女士羅跪堂下。⁽³⁰⁾

這其實是對做彌撒過程的描述，而“大僧誦經於壇上，女士羅跪堂下”儼然一佛教道場。教堂外部的情况如何呢？

前門兩塔作四層，刻像皆漸尖狹，頂作棘刺形，十丈許，上作十字為寶相矣。中頂高處，玲瓏三門，兩在二塔下，一在中。左右四層，下窗二，上窗一，如是各二層。門刻十數桁，每桁刻像滿焉。窗皆四桁，雙塔塔中作尖層，層尖稜瘦刻，每尺許一稜。第三層以上，四角尖稜，另作小塔，尖稜各三層。東西亦作三門，門中立柱，分為二柱，中刻一像，左右刻稜桁無數，左右各七像，上列六小像，正門上列像四行，極其刻劃，其門簷作人像，憑空斜飛。

廟身左右五間窗，上下二層同，距各丈許，每窗隔作牆，每牆二尖稜，高二丈，每稜亦須十數小稜。塔下小上大，中作門形。後殿圓拱處，左右三窗三牆，牆頂各作稜塔三，每塔三重，亦有多數小塔圍之，各駕成橋形。內室頂皆作穹，左右各八。前為噴水池。⁽³¹⁾

康有為不厭其煩地對大教堂的建築作了異常詳細的說明，其後康有為對科隆大教堂跟其它國家他參觀遊覽過的教堂作了比較：

此廟以瑰麗論，遠不如羅馬之彼得、保羅貳廟；以峨特式論，則美蘭那之廟第一；以高論，挖頓壁邦烏弄第二，此為第三，可謂奇偉之大工矣。

彼得、保羅以文石勝，刻劃五色，清嚴妙麗，誠無得而比焉。宇內祇有印度沙之汗陵君士但丁之生蘇非廟可相方耳。若以工程奇妙，則無如峨特式焉。狀如崩雲聳天，峭突稜起，吾所見各國祔祠，峨特式亦多矣，班、葡尤盛，而無能比美蘭與法論者，觀此乎亦可觀止矣！⁽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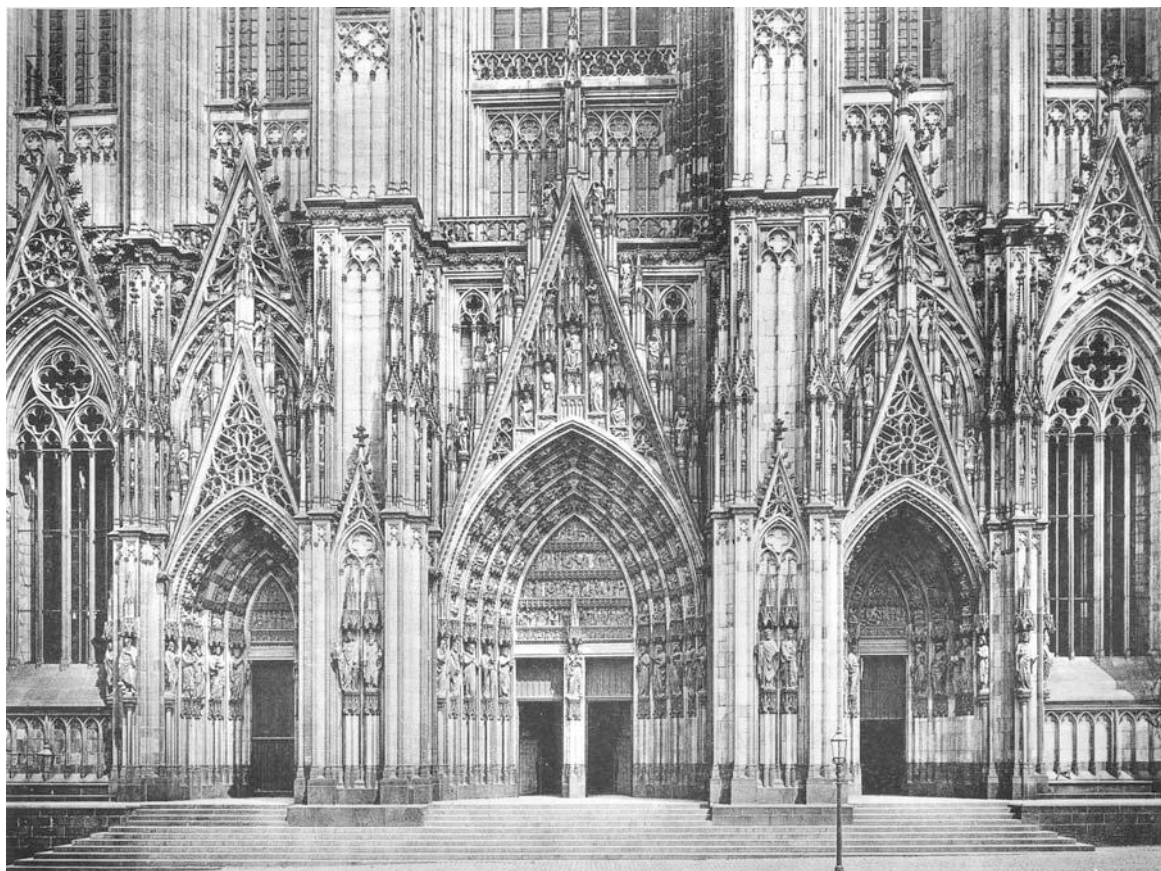
儘管在很多方面科隆大教堂都不是世界第一，但由於它建造得晚，因此它將哥特式的建築

風格發揮到了極致。這同時也表現了日爾曼民族至今仍然保持的學習、改良和精益求精的民族性格。故而康有為認為，建了五個多世紀並且在科隆大教堂之後(1897)才落成的米蘭大教堂與科隆大教堂可謂精美絕倫，因此他發出“觀此乎亦可觀止矣”的感歎。接下來，康有為感慨以此為名勝前來觀瞻者絡繹不絕：

法論官署、銀行、郵館、諸大客棧，皆四環此祔祔祠，以遊客之來，皆為此祔祠來也。一名字之動人如此！⁽³³⁾

而中世紀時，為了存放三聖王的遺骨而決定修建的大教堂，一方面當然是出於虔誠的宗教意圖；而另一方面，它同時也成為遠方朝聖者的目標，從而成為原本就強於經濟的科隆人的搖

錢樹。與斌春、張德彝以傳統的認知方式來考察西洋不同，康有為有感於在德國的所見所聞，更多地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考辨與思量。在對科隆大教堂本身進行描述後，他也特別關注由大教堂所帶動的周邊商業的發展，顯然他認為這對當時的中國具有借鑒的意義。因此，從早期的失之瑣碎而缺乏洞見和啟發意義的遊記相比，康有為的描述顯然將個人的自我經驗與民族意識乃至民族危機相互交織在了一起，通過觀瞻而開始比較，由比較而借鑒，由借鑒而產生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洞見。實際上，汗漫四海的十餘年流亡生涯，康有為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着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十六年於外，無所事事，考政治乃吾專業也。”⁽³⁴⁾ 康有為遊記的目的無非是將外國歷史的經驗運用到中國現實的政治之中。他在遊意大利宮室時想到的是秦漢



朝西的正門 Max Hasak (1856-1934)

文明，並且進一步認為：“吾國人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遊外國地。以互證而兩較之，當不至為人所恐嚇，而自退處於野蠻也。”⁽³⁵⁾ 康有為在歐洲的見聞，是他對中國社會未來設立了更為理性的藍圖。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得出，張德彝的記載(1866)明顯以中國傳統的範式來解讀所遭遇的新事物，使用天干地支紀年。李鳳苞(1878)已經用公元紀年來言說西方的歷史事件了。而到了戴鴻慈(1906)則更進一步使用西方的計時方式了。

六

域外的旅行所出現的空間的轉換對於多年來閉關鎖國的晚清智識分子(其中丁韞良當然除外)來講，必然會產生對“祖宗之法不可變”古老法則的解構，導致對原本根深蒂固觀念的鬆動，引發新的思考。從這些智識分子對科隆及大教堂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從對抗、衝突，走向磨合、轉變的過程。同時，正是借助於在西方的觀察，在本土因司空見慣而被遮蔽的許多事物也重又凸顯了出來，同時也使這些學者逐漸擺脫了本土文化視野的局限，從而促成了觀念的轉變。這一中西時空上的轉變，對這些到西方去遊歷的晚清官員來講無疑是一種對現代性的體驗。不得不承認的是，從大多數描寫中，不難看出長於人文而疏於科技的中國官員依舊沒有真正意識到現代技術，尤其是現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對於強國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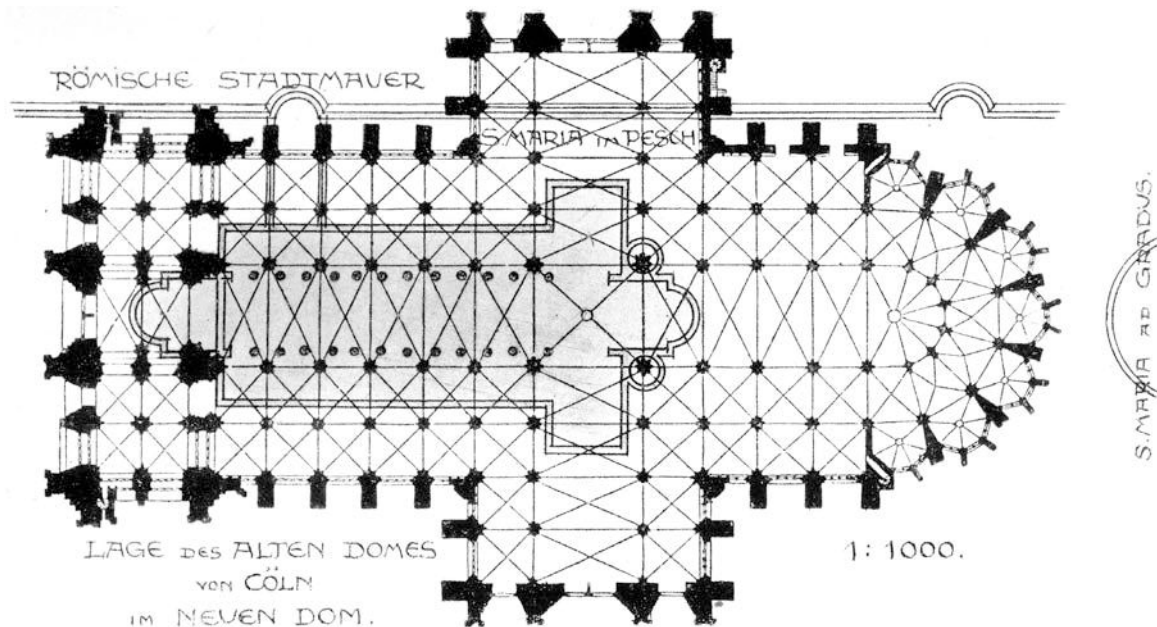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使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術語“前理解”(Ververständnis)來說明相對於某種理解以前的理解，而這對於理解是不可避免的，這同時也是保證理解的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前提。依據海德格爾的說法，一切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礎之上所達到的新的理解：“將某物解釋為某物，其基礎在於前具有(Vorhabe)、前見

解(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解釋從來不是對一項先行給定的事物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³⁶⁾ 伽達默爾在海德格爾的基礎之上提出了“理解的歷史性、視界融合和效果歷史”的闡釋學原則。如果我們將西方作為一個文本來對待的話，那麼任何對西方的解讀和理解，都無法超越歷史時空的現實境遇。闡釋者與文本既是歷史的存在，同時又處於不斷形成的過程之中。因此，理解的視界(Horizon)同樣具有歷史性，也是一個不斷形成與變化的過程。對文本原意從來就沒有我們以往所想像的所謂“唯一正確”的理解。沒有過去，現在的視界就不會形成。因此，不僅僅晚清智識份子對西方的理解具有歷史性，我們今天同樣無法超越它。“解釋開始於前把握(Vorbegriffen)，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適的把握所代替：正是這種不斷進行的新籌劃過程構成了理解和解釋的意義運動。”⁽³⁷⁾ 伽達默爾對海德格爾對“闡釋學迴圈”(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解釋的理解，無疑可以幫助我們今天更好地理解晚清智識分子的世界觀。

【註】

- (1) 海涅著，馮至譯《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24。
- (2) 本文作者譯：Heine. *Ein Lesebuch für unsere Zeit*.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9, S. 81.
- (3) “自西千二百三十年，當宋理宗時創建”，見康有為《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449。而收入《列國遊記——康有為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的《補德國遊記》中卻改為了“自其十三紀，當宋理宗時創建”(第401頁)。
- (4) 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集之張德彝《航海述奇·歐美環遊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566。
- (5) 張德彝《隨使英俄記》(四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VII集之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350。
- (6) 郭嵩燾在光緒四年(1878)五月十五日(6月15日)的倫敦日記中寫道：“李丹崖見示所繪《天下全圖》。……丹崖輿地之學，必能有傳，於此尤為偉舉。”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IV集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624-625。

- (7) 李鳳苞撰〈使德日記〉，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使德日記及其他二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初版，第4-5頁。
- (8) 至今在科隆市當年這一部落的所在地仍被稱為烏比爾環路(Ubierring)。
- (9) 如劉錫鴻在《日爾曼紀事》中稱德皇為“開色”，皇后為“開色鄰”(Kaiserin)，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VII集之劉錫鴻《英軺私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第213頁及以下。
- (10) (11) 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V集之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354；頁470。
- (12) 徐建寅〈歐遊雜錄〉，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VI集之徐建寅《歐遊雜錄》，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737。
- (13) 圖見徐建寅《歐遊雜錄》，出處同上，頁722。
- (14) (15)(16) 丁韞良《西學考略》，清光緒九年(1883)同文館鉛印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99·子部“西學譯著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93下；頁693頁下-頁694上。
- (17)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VIII集之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337。
- (18) 〈聘德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IX集之蔡爾康等《李鴻章歷聘歐美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72。本書在第263頁上的“譯名簡釋”中將“哭龍姆”解釋為“Clerf, 克萊夫”(盧森堡的一個區名?)顯然是誤植。
- (19) 《和輶小志》，出處同上，頁76。
- (20) (21) (22) 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IX集之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424；頁425-426；頁427。
- (23) 見前揭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頁5。
- (24) (25) 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版本如前揭，頁427-428；頁428。
- (26) 康有為〈德國遊記〉，收入《列國遊記——康有為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頁。
- (27) (28) (29) (30) (31) (32) (33) 康有為〈補德國遊記〉，收入《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448-449；頁449；頁449-450；頁450。
- (34) 康有為〈共和平議〉，收入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臺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第13集，頁1。
- (35) 康有為〈意大利遊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X集之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頁115。
- (36) 本文作者譯文，原文見：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79, S. 150.
- (37)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頁343。



大教堂平面圖 Max Hasak (1856-1934)